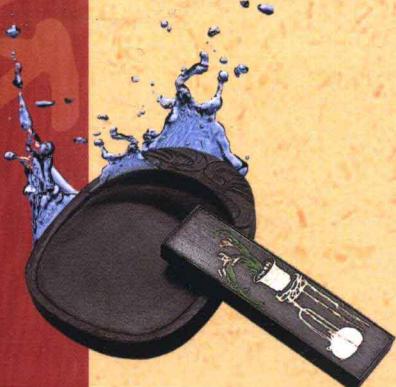


湖北省重点学科立项建设学科成果

# 司齒齒与

《汉晋春秋》研究

余鹏飞 著



湖北省重点学科立项建设学科成果

# 习 齿 齿 与

《汉晋春秋》研究

余鹏飞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习凿齿与《汉晋春秋》研究/余鹏飞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 - 7 - 216 - 07747 - 7

I. 习…

II. 余…

III. ①中国历史—东汉时代

②中国历史—西晋时代

③《汉晋春秋》—研究

IV. ①K234.207 ②K237.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1994 号



习凿齿与《汉晋春秋》研究

余鹏飞 著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85 千字

插页:3

版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7747 - 7

定价:3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 前 言

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尤善尺牍论议。为东晋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地方史学者。他初为州府幕佐，年未三十，便由州从事、西曹主簿升至治中、別驾。后因溢美“相王”，大忤桓温，被贬为户曹参军。又因为其二舅职位偏低，屡经陈请，激怒府主，被外放衡阳太守（一说荥阳太守）。在太守任职期间，他为了抑制荆州刺史桓温觊觎东晋政权的野心，撰写了《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该书“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反映他崇蜀抑魏的思想。后又撰写了《襄阳耆旧记》（五卷），其子习辟强又将其撰写的其他文章编纂成《习凿齿集》（五卷）。后因襄阳一度被前秦苻坚所占领，习凿齿也曾一度被前秦虏至长安，不久便因脚疾回乡居住。襄阳被东晋收复后，朝廷命他“典国史。会卒，不果”。临终前他上疏东晋朝廷，表达“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提出以蜀汉为正统的新正统论。终年六十余岁。

有关习凿齿的生卒年代、生平事迹、晚年活动轨迹等问题，《晋书》卷八十二有传，然本传所载，止于大略，且多语焉不详，留意问津者又互有乖背，有待厘清。

习凿齿所撰写的《汉晋春秋》，约于唐末五代时就散佚了。清人汤球、黄奭、王仁俊三人从《三国志》、《世说新语》、《宋书》、《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群书治要》、《艺文类聚》、《文选》、《初学记》等书中注引的《汉晋春秋》内容摘出各辑刊刻佚书。“汤球辑本的特点是：经过对史事发生年代的查考，将每条遗文都编排于相应年月之下，力图恢复原书编年纪事的原



貌。为此，他常常补加一两句文字，用方括号标示出来，使整段遗文语义更加明晰。其缺点是不了解各编年体晋史具有因采用追叙法而使人物事迹比较集中的特点，往往将《世说新语》、《太平御览》等书中原引为一整段的文字予以拆散，分编于各个史事发生的年代之下。黄奭辑本的优点是校勘比较细致，别本异文注释得详细”<sup>①</sup>。乔治忠校注的《众家编年体晋史·汉晋春秋》，除以汤球辑本为底本之外，还将黄奭辑本作为“补遗”进行收录。乔的校注本虽比较全面，但他没有指出因版本不同而导致文字表述的不同，更没有判定谁的表述较为准确、贴切，也没有明确指出哪段或哪几段内容不是《汉晋春秋》原书的内容，尤其是有些文字与汤球辑佚书表述的不同，更使人难以捉摸和判断，不知究竟谁是正确的。

笔者曾将《三国志》裴注中有关《汉晋春秋》的材料以及汤球、黄奭、王仁俊等三人分别所辑佚的《汉晋春秋辑本》、今人乔治忠校注的《众家编年体晋史·汉晋春秋》等书进行比对、甄别、校勘之后编撰了一个新辑本——《校补汉晋春秋》<sup>②</sup>。它不仅对辑文的字词表述、编年的确定，甚至文句的标点符号等都进行了斟酌和考量，对不是《汉晋春秋》所记述的内容，有的以“质疑”的形式予以标识，有的则全部剔除其内容。这本对《汉晋春秋》内容剖析的书，即是以《校补汉晋春秋》所辑录的 107 条材料（“质疑”材料在外）为依据而撰写的。

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根据汤球辑本卷一的三段辑文内容分析后认为，它“不是《汉晋春秋》中的文字”<sup>③</sup>，而“是《习凿齿集》的主要内容”<sup>④</sup>。笔者认为习凿齿新正统论仍是《汉晋春秋》书中的主要内容，其观点的几个要素仍可在该书中找到，“新正统论”仍然成立。他在《汉晋春秋》书中要告诉世人的是：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大一统。如果说，“大一统”是正统论中的精髓，那《汉晋春秋》中确实用大量史料宣传蜀汉政权以及刘备、诸葛亮

<sup>①③</sup> 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第 5、9 页。

<sup>②</sup> 《校补汉晋春秋》，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9 月版。

<sup>④</sup> 黄惠贤：《习凿齿卒年及其著作的检讨和蠡测》，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第二十六辑，第 43 页。

的政治理想和实现大一统的种种实践活动。因此，该书与陈寿《三国志》宣传的以曹魏为正统的说法是不同的，我们虽不能窥探出习凿齿史学思想的全貌，但通过细心爬梳稽考，仍可看出他的历史意识和《汉晋春秋》的史学价值。

上述有关习凿齿的生平业绩以及对《汉晋春秋》内容和史学价值等问题的分析，历代以来虽有不少同仁进行过探讨和研究，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广泛采纳其研究成果〔如《校补汉晋春秋》原书卷二为“三国时期”，现采用柯美成《〈汉晋春秋〉通释》将卷二改为“蜀汉（附魏、吴）时期”〕，拟就上述问题作些摸索、探讨，以“抛砖引玉”。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可能有偏颇、谬误的地方，敬请方家和读者不吝赐教。谢谢！

余鹏飞

于襄阳古隆中 2012 年 10 月

# 目 录

<b>第一章 习凿齿及其撰写《汉晋春秋》的时代背景</b>	1
<b>第一节 习凿齿成长之路</b>	1
一 习凿齿家世	1
二 习凿齿初任官职	3
三 习凿齿被贬	7
四 习凿齿的晚年	12
<b>第二节 桓温的出身与性格</b>	18
一 桓温的身世	18
二 桓温性格与品行	19
<b>第三节 习凿齿为“裁抑桓温”撰写史书</b>	24
<b>第二章 《汉晋春秋》内容剖析</b>	30
<b>第一节 补充三国新材料</b>	30
一 诸葛亮、刘备散论	31
二 曹操评议	45
三 司马氏与曹氏集团争权刍议	48
四 蜀汉亡因探析	54
五 司马氏政治品质、军事才能评析	61
<b>第二节 社会关系处置原则</b>	70
一 臣忠君	70
二 顾大局，不计恩怨	77



三 讲义气、重人性 .....	80
四 儒学为评人和事的依据 .....	87
第三节 记述朝廷礼俗、内斗、地方建置变化及其他 .....	91
一 朝廷礼制习俗 .....	91
二 宫廷与朝廷内部争斗 .....	95
三 地方行政建置变化及其他 .....	101
第四节 记述形式多样 .....	104
一 讽纬预言 .....	104
二 逸事、灾害、书信 .....	108
三 多样化 .....	116
 第三章 论《汉晋春秋》的史学价值 .....	124
一 秉笔直书成信史 .....	128
二 确认新正统史观 .....	130
三 选材、语言、评议均创新路 .....	135
 附录 《校补汉晋春秋》 .....	138
第一卷 东汉时期（公元 25—220 年） .....	138
第二卷 蜀汉（附魏、吴）时期（公元 221—264 年） .....	165
第三卷 西晋时期（公元 265—316 年） .....	238
 参考文献 .....	263
后记 .....	265

# 第一章

## 习凿齿及其撰写《汉晋春秋》的时代背景

### 第一节 习凿齿成长之路

#### 一 习凿齿家世

据《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记载：“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习氏在两汉时期是今湖北襄阳地区的富家豪族。《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州郡部”引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岘山南至宜城百余里，旧说其间雕墙崇峻。汉灵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人，朱轝骈耀，华盖接阴，同会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敕县号为冠盖里。”<sup>①</sup>

这是说东汉末年襄阳城至宜城间近百里地住有卿、士、刺史等高官、世族、豪富等数十家，诸如庞家、蒯家、蔡家、马家等等，其中还包括家财万贯的襄阳巨富习家，《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附子简传》所说：“诸习氏，荆土豪族。”如习融及其子习郁，《说郛》卷五十八引《襄阳耆旧传》“习融”条曰：“后汉习融，襄阳人，有德行，不仕。子郁，字文通，为黄门侍郎，封襄阳公。”吴庆熹案曰：“考异：‘黄门侍郎’，他书多止作‘侍中’。‘襄阳公’亦应作‘襄阳侯’。”<sup>②</sup>可知习郁为光武帝侍中、大鸿胪，以功封襄阳侯。但是，习氏不是当地高门大族，习凿齿父祖不见于经传史籍，可以说是

<sup>①</sup> 《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第765页。

<sup>②</sup> 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67页。



默默无闻，以致王献之要以寒士目之，不愿与习凿齿“并榻而坐”。据《世说新语·忿狷》第6条载：“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刘孝标注引刘谦之《晋纪》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所谓“不交非类”，余嘉锡先生作案曰：“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而子敬不与之并榻，鄙其出身寒士，且有足疾耳。所谓‘不交非类’者如此。非孔子‘无友不如己者’之谓也。”<sup>①</sup>可知王献之不愿与之并榻而坐，主要在于门第的不同，王献之出身于当时显赫的世族高门王氏，习凿齿的出身门第与之相比，就显得寒微了，刘静夫先生说：“上述情况，证明习氏可能属‘次门’一类。”<sup>②</sup>但就当时的襄阳地区来说，习氏还是很有名望、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家族。《方舆胜览》卷三十二《京西路·襄阳府》中“古迹·习家池”条下注引《襄阳记》时说：“岘山南有习郁大鱼池，依范蠡养鱼法，当中筑一钓台。将亡，敕其儿曰：‘必葬我近鱼池。’山季伦每临此，必大醉而归。按：郁，后汉人，封襄阳公，即凿齿之先也。”<sup>③</sup>此祝穆之言，可为一证。

汉末三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习氏家族成员也分散在各地做官。其中在曹魏的有习授，据《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吴书》记载，娄圭其所以被曹操所杀，就是由于他告密的结果。该书曰：“子伯（娄圭字——引者注）少有猛志，尝叹息曰：‘男儿居世，会当得数万兵千匹骑著后耳！’侪辈笑之。后坐藏亡命，被系当死，得逾狱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变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觉，遂以得免。会天下义兵起，子伯亦合众与刘表相依。后归曹公，遂为所用，军国大计常与焉。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遂进兵。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娄子伯富乐于孤，但势不如孤耳！’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1040~1041页。

② 刘静夫：《习凿齿评传》，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5月版，第323页。

③ 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8年6月版，第577页。

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sup>①</sup> 从此材料可知，一个至诚投靠曹操的又为其赞许有计谋的人最后被杀，原因之一就是习授告密。

另外在蜀汉的有习禎，《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襄阳记》曰：“习禎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sup>②</sup> 后随先主人蜀，历雒、郫令，广汉太守。禎子忠，官至尚书郎。忠子隆，掌校秘书，为步兵校尉。

在东吴的有习温，他以稳重著称。《襄阳耆旧记》卷一《习温》载曰：“习温，识度广大，历长沙、武昌太守、选曹尚书、广州刺史。从容朝位三十年，不立名迹，不结权豪。饮酒一石乃醉。有别业在洛上，每休沐，常宴其中……潘濬见习温十数岁时，曰：‘此儿名士，必为吾州里议主。’敕子弟与善。温后果为荊州大公平令。”<sup>③</sup> 两汉三国时期襄阳习氏家族的详细情况，详见拙文《汉末三国时期襄阳习氏家族考释》<sup>④</sup>。

## 二 习凿齿初任官职

习凿齿出生在这样一个“乡豪”家庭，自然是地位显赫，加之他“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学著称”，为当地响当当的著名人物。按照东汉以来选拔官员的惯例，州、郡、县一级官吏由中央朝廷委派为刺史、太守、县令，但地方僚佐则由刺史、太守、县令从当地辟除。久而久之，长官与下属、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以外，还有一层君臣名分。当时的荊州刺史桓温就“辟”习凿齿为从事。另据《晋书》卷八《穆帝纪》记载：“（永和元年八月）庚辰<sup>⑤</sup>，以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荊州刺史。”<sup>⑥</sup> 由此可知，桓温为荊州刺史是在穆帝永和元年（345）九月十三日。

<sup>①</sup> 《三国志》卷十二《崔琰传》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374页。

<sup>②</sup> 《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第1085页。

<sup>③</sup> 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0~21页。

<sup>④</sup> 见《襄樊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sup>⑤</sup> 《晋书》卷八《穆帝纪》卷末“校勘记”称：“庚辰，八月戊戌朔，无庚辰。庚辰为九月十三日。”

<sup>⑥</sup>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192页。



桓温辟召幕僚习凿齿为荆州从事之事应当在永和元年九月末或十月以后的事。

另外，习凿齿之所以受桓温亲遇、提携，与江夏相袁乔多次在桓温面前称赞习氏有关。《晋书·习凿齿传》曰：“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江夏相袁乔深器之，数称其才于温，转西曹主簿，亲遇隆密。”而江夏相袁乔又与桓温关系甚为密切。据《晋书》卷八十三《袁瓌传附子乔传》记载，永和二年（346）冬至永和三年（347）三月，“桓温谋伐蜀，众以为不可”，袁乔劝告桓温以“轻军速进”，并认为“若袭而取之者，有其人众，此国之大利也”。桓温听后“从之”，并“使乔以江夏相领二千人为军锋”。后“乔因麾而进，声气愈厉，遂大破之，长驱至成都”。永和三年四月，桓温振旅还江陵。四年（348）八月，论平成汉功，桓温升任征西大将军，封临贺郡公；袁乔“进号龙骧将军，封湘西伯，寻卒，年三十六”<sup>①</sup>。按上记载，袁乔任江夏相当从永和二年至永和四年冬，习凿齿由州从事升任西曹主簿就应当是在桓温平成汉还江陵后，即永和三年（347）五月或四年（348）八月稍前之事。其原因有二：一是袁、习二人从相识、熟悉、器重，到袁乔多次向桓温举荐习凿齿，理应是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二是从346年冬到347年的农历四月，袁乔一直忙于协助桓温伐蜀平乱，似无暇他顾。从袁乔于永和四年（348）八月后不久去世，可知习凿齿从州从事升至西曹主簿，是袁乔去世前一段时间内。

根据《晋书·习凿齿传》记载，习凿齿任西曹主簿后与桓温关系更为密切，“亲遇隆密”，不久便“累迁别驾”。但《世说新语·文学》第80条曰：“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笺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曰：“凿齿少而博学，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即由从事至西曹主簿，再至治中）。”<sup>②</sup>上述两书均称习凿齿为荆州治中，不及别驾；但又有书曰习氏曾担任荆州从事和别驾。《世说新语·言语》第72条曰：“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sup>③</sup>刘孝标注引何法盛《中兴书》曰：“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少以文称，善尺牍。桓温在荆州，辟为从事。历治

①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168～2169页。

②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305页。

③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157页。



中、别驾，迁荥阳太守。”有学者据此认为习凿齿由州从事到西曹主簿再到治中是永和元年间一年间所发生的事。熊明先生说：“习凿齿在桓温代庾翼出镇荆州的永和元年（345），即辟习凿齿为从事，也就是在这一年之中，由于桓温称赞习凿齿之才，对之‘亲遇甚密’，习凿齿由此‘岁中三转’，由从事至西曹主簿，再至治中。”<sup>①</sup>但《北堂书钞》卷七十三《设官部·别驾·在州境十年》条注引《晋中兴书·习录》云：“习凿齿，刺史桓温甚器之，在州境十年。”<sup>②</sup>这则材料告诉我们：习凿齿受桓温器重，在荆州任职十年。因此，黄惠贤先生认为：“‘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结合《晋中兴书》记载，如果习凿齿以二十岁出为荆州从事，年未三十便升迁为州治中（其时限大约是穆帝永和元年至十年，即345—354年），确实表明‘宣武甚器之’；‘自从事至主簿，已在‘二岁’以上，‘岁中’显误；而‘在州境十年’一句，就又为我们注释了‘岁中三转’实为‘十岁中三转’之讹误。”<sup>③</sup>黄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

从上述史实可知：穆帝永和元年（345）习凿齿为荆州刺史桓温辟召为州从事后，经江夏相袁乔推荐，随即升为西曹主簿，后因得到桓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便又相继提升为治中和别驾，时年虽未满三十，但从州从事到别驾，前后在荆州任职就有十年。故可推测习凿齿约出生于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左右。

从上分析得知，所谓“一年之中习凿齿就从州从事升至治中、别驾”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难以使人信服的。要说“桓温在一年之中将其僚佐由从事提拔为治中”的，不是习凿齿，而是另有其人，即车胤。据《世说新语·识鉴》第27条“车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识，裁见，谓其父曰：‘此儿当成卿门户，宜资令学问。’胤就业恭勤，博览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继日焉。及长，风姿美劭，机悟敏率。桓温在荆州取为从事，一岁至治中。胤既博学多闻，又善于激赏，当时每有盛坐，

<sup>①</sup> 熊明：《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59页。

<sup>②</sup> 《北堂书钞》，台湾文海出版社1978年1月版，第319页。

<sup>③</sup> 黄惠贤：《〈晋书·习凿齿传〉评述》，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58页。



胤必同之，皆云：‘无车公不乐。’太傅谢公游集之日，开筵以待之。累迁丹阳尹、护军将军、吏部尚书。”<sup>①</sup> 文中明确说是“一岁”，即一年之中的意思。而且只是从州从事升至治中，只是第二次升迁，没有第三次的再迁。

这里要指出的是，“别驾”是习凿齿在荆州所任的最高职务同时也是最后的职务。此后他便因与桓温产生矛盾而得罪了桓温，离开荆州了。

另外，关于“治中”和“别驾”的区别一事，黄先生认为：“别驾、治中均为州府幕佐之长，俗称‘纲纪’。”<sup>②</sup> 他又说：“别驾和治中，一主外，一主内，是刺史的左右手。上引《晋书·习凿齿传》称，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实际上包括本传所载‘别驾’和《续晋阳秋》、《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治中’两职的职能；不过‘别驾’之职略高于‘治中’，或许因此之故，本传只载‘别驾’一职？”<sup>③</sup> 这说明当时的习凿齿在州内掌握了实权，控制着州里的内外政要，确实得到州刺史桓温的重用。习凿齿也忠心耿耿地履行本职工作，为府主服好务。《晋书·习凿齿传》载：“时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执手问国家祚运修短。‘星人’的答复引起‘温不悦，乃止。异日，送绢一匹、钱五千文以与之’。‘星人’不理解其意，以为‘赐绢一匹，令仆自裁，惠钱五千，以买棺耳’，使去询问习凿齿。习凿齿便向他解释道：‘君几误死！君尝闻干知星宿有不覆之义乎？此以绢戏君，以钱供道中资，是听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诣温别。温问去意，以凿齿言答。温笑曰：‘凿齿忧君误死，君定是误活。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sup>④</sup> 字里行间表露出桓温对习凿齿才华的欣赏和好感，同时也显示他请人看天象是想从自然角度找到取代东晋朝廷的依据，但是“星人”却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做，引起桓温的不满。在“星人”感到生命难保之时，是习氏的一句话救了他一命，桓温看在习凿齿的面子上，免其一死。《晋书·习凿齿传》又记载道，习凿齿自担任别驾之后，“温出征伐，凿齿或从或守，所在任职，每处机要，莅事有绩，善尺牍论议，温甚器遇之”。虽然习凿齿在任职期间“莅事有绩”，后因“忤旨”桓温而被贬职。

①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484页。

② 《〈晋书·习凿齿传〉评述》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7页。

③ 黄惠贤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7~58页。

④ 《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传》，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152~2153页。

### 三 习凿齿被贬

习凿齿和桓温之间到底是因什么问题产生了矛盾呢？根据史料记载，主要是在对两件事情的处理上，两人观点不一致而产生意见分歧和矛盾。

第一件事是，司马昱“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尝与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载游版桥，温遽令鸣鼓吹角，车驰卒奔，欲观其所为。晞大恐，求下车，而帝安然无惧色，温由此惮服”<sup>①</sup>。这说明司马昱与桓温少时关系比较好，后来彼此之间就产生矛盾了，两者之间关系虽未破裂，但彼此间对武陵王司马晞谋反一事的处理上意见相左，《晋书》卷九《简文帝纪》曰：“（咸安元年冬十一月）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自列与太宰、武陵王晞等谋反。帝对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有司承其旨，奏诛武陵王晞，帝不许。温固执至于再三，帝手诏报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复敢言。乙卯，废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sup>②</sup>在司马昱刚即皇帝位时，桓温“出次中堂，令兵屯卫”。显示桓温与司马昱之间还较协调，桓温做了身为大臣所应做的事。但当司马晞谋反事暴露后，一些大臣主张诛杀司马晞，但作为皇帝的司马昱却不同意，还要桓温“避贤路”，因为直指了桓温有谋篡之意，迫使桓温“流汗变色，不复敢言”，从此两者之间的矛盾便产生了。接着，简文帝任大司马桓温为丞相，桓温“不受”。《晋书·习凿齿传》称，当时习凿齿与“清谈文章之士”的韩伯、伏滔等人“并相友善”。[《世说新语·言语》第72条曰：“王中郎（坦之，字文度）令伏玄度（滔字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韩伯字康伯）。”]后来，约在太和元年（366）至咸安一年（371）即司马昱为丞相至其登基为帝期间，习凿齿奉桓温命出使京师，到京都后他又受到时为相王的简文帝（即司马昱，晋元帝少子，永昌元年即322年封琅邪王，永和元年即345年穆帝二岁即位，太后褚氏摄政。咸安元年（371）司马昱即位为简文帝，但常称“相王”）的“雅重”。习氏返回荆州时，“温问：‘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见。’以此大忤温旨，左迁户曹参军”<sup>③</sup>。为何桓温听到习凿齿回

<sup>①</sup> 《晋书》卷九《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23页。

<sup>②</sup>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20~221页。

<sup>③</sup>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153页。



答后如此大动肝火和不满呢？是触动了桓温的哪一根神经到非要贬抑习凿齿的职务才能解决问题呢？据《晋书·桓温传》载：这是因为“及石季龙死，温欲率众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时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惮也……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行达武昌，众四五万。殷浩虑为温所废，将谋避之，又欲以驺虞幡住温军，内外噂嗒，人情震骇。简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随即上疏表达“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时殷浩至洛阳修复园陵，轻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温复进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废浩，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sup>①</sup>。在桓温大权在握的情况下，习氏一味表彰相王的为人，当面赞美司马昱，从而引起桓温的不满是必然的，于是便将习凿齿贬抑为户曹参军（所谓“户曹”，是州内掌管户籍、祀祠、农桑的官署，“参军”便是该官署职位比较低的办事官员）。也有可能是习凿齿当面称赞司马昱是有意为之，也是用来检验桓温的品行和人格，因为习凿齿在桓温幕府十余年，对他的野心滋长过程看得很清楚。此时桓温的篡夺野心已经开始暴露了，而习凿齿又是反对桓温篡位的。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件事是，习凿齿初升任桓温的别驾之后，因为自己的职位超过其两个舅舅所任的职位，便多次向桓温请求提拔他的舅舅，从而引起桓温的生气。《晋书·习凿齿传》云：“初，凿齿与其二舅罗崇、罗友俱为州从事。及迁别驾，以坐越舅右，屡经陈请。温后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出凿齿为荥阳太守。”<sup>②</sup> 习凿齿请求为两个舅舅提升官职，他明知按桓温的人品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这是习凿齿的借口，目的是想离开桓温的控制，以便能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还可在桓温篡夺阴谋暴露后朝廷在追究此事时可免受牵连。

关于罗崇、罗友之事，《世说新语·任诞》第44条曰：“罗友作荊州从事。”余嘉锡引《渚宫旧事》云：“（罗）友与兄崇及甥习凿齿同为（桓）温

①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569~2571页。

② 《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2153页。

从事。”<sup>①</sup> 罗友虽清贫无食又有点痴，但记忆力很强，办事很认真。《世说新语·任诞》第41条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该书云：“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怍容。为人有记功，从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阙观宇，内外道陌广狭，种植果竹多少，皆默记之。后宣武漂洲与简文集，友亦预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遗忘，友皆名列，曾无错漏。宣武验以蜀城阙簿，皆如其言。坐者叹服。”<sup>②</sup>

这个故事在《晋阳秋》中也有记载。《世说新语·任诞》同卷同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友字它仁，襄阳人。少好学，不持节俭。性嗜酒，当其所遇，不择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余食，虽复营署垆肆，不以为羞。桓温常责之云：‘君太不逮！须食，何不就身求？乃至于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复无。’温大笑之。始仕荊州，后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虽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诞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溫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门，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见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见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后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薨于益州。”<sup>③</sup>

罗友确实很有才能，只不过家境过于清贫而好吃。关于罗友好吃之事，《世说新语·任诞》第44条曰：“罗友作荊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騎集別。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復須駐。’了无慚色。”<sup>④</sup>

罗崇初为襄陽都督，后提升为竟陵太守。《晋书》卷八《废帝海西公纪》记载：“（太和二年）夏四月，慕容𬀩将慕容尘寇竟陵，太守罗崇击破之。”《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附子豁传》记载：“南阳督护赵弘、赵忆等逐太守

<sup>①</sup>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891页。

<sup>②</sup>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885～886页。

<sup>③</sup>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886页。

<sup>④</sup>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891页。